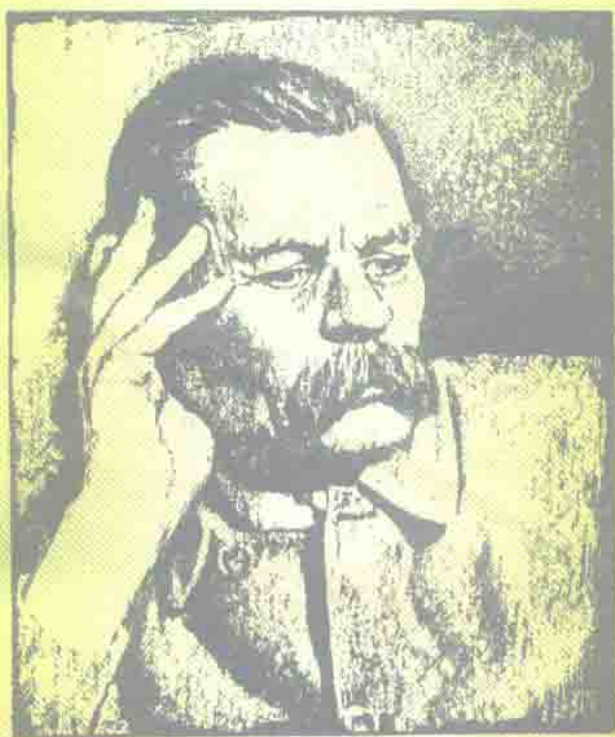




我的大学

(苏联) 高尔基 著

我的大学

〔苏联〕高尔基著

陆 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М. ГОРЬКИЙ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据 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ТОМ 13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1) 译出。

我的大学
Wode Daxu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17,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1}{4}$ 插页2

1956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2版

1988年5月北京第9次印刷

印数 307,201—341,540

ISBN 7-02-000285-4/I·286

定价 1.55 元

出版说明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

作品记述了高尔基在喀山时期的生活。十六岁那年，他离乡背井，到喀山去上大学。这个幻想破灭后，他不得不为生存而劳碌奔波。住“大杂院”，卖苦力，同流浪汉接触，和形形色色的小市民、知识界与思想界人士交往，进了一所天地广阔的“社会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他经历了精神发展的复杂道路，经受住多方面的生活考验，对人生的意义、对世界的复杂性进行了最初的探索。

《我的大学》于一九二二年初动笔，至翌年春完稿，并陆续发表在一九二三年《红色处女地》杂志第二至第四期。中译本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十三卷，一九五六年曾在我社出版。本书根据我社《高尔基文集》第十六卷印制。

于是，我就去喀山大学学习了^①，起码也是这样。

引起我上大学这个念头的，是中學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这个青年很讨人喜欢，也长得很漂亮，有一对象女人般温柔可爱的眼睛。当时他住在我们那一幢房子的阁楼上，因为常见我手里拿着书，他对我注意起来，于是我们彼此认识了。过不了多久，叶夫列伊诺夫竟然硬说我有“研究科学的特殊才能”。

“您天生是为科学服务的！”他潇洒地甩动着他那马鬃一样的长头发，对我说。

当时我还不懂得，就是一个家兔也可以为科学服务。可是叶夫列伊诺夫很热心地向我说明：各大学里正需要我这样的青年人。自然，也提起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②的故事来了。叶夫列伊诺夫还说，我去喀山以后，可以寄住在他的家里，过一个秋季和冬季，读完中学的课程，“随便”去应几场考试（他说的是“随便”！）我就可以领到助学金上大学，再过这么五年工夫，我就变成一位“学者”啦。照他说来一切全很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当时才不过十九岁，又有着一副好心肠。

他在中学期考完毕，就离开这儿回家去。过两星期，我跟着也动身了。

我的老外祖母给我送行时，劝我说：

“你，别再跟人发脾气了！你老是发脾气，学得又厉害，又高傲！这全是跟你外祖父学坏了的！你没见你外祖父落了个啥下

① 时间大概是在一八八四年夏末或秋天。

②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罗斯第一个大学者，著名诗人。

场？苦命的老头子，活呀活的，活成个老傻瓜啦！你要记住：上帝不议论人的是非，魔鬼才爱干这种事呢！再见吧！唉……”

她擦掉她那松弛的老脸上几滴可怜的泪珠，又对我说：

“咱们再也不能见面啦！你这跑野了心的孩子呀，远走高飞了，我可是个活不久的人了！……”

近几年来，我经常离开我这个好心的老外祖母，甚至很少跟她见面。我一想到这个骨肉相连、热情照顾我的亲人，当真要和我永别了，心里十分难过。

我站在轮船的船尾一直向她望着，她站在码头边缘，一手画十字，一手拿破肩巾角儿擦她的脸，擦她那一双总是对人闪烁着无限慈爱光芒的黑眼睛。

于是我就来到这个半鞑鞑式的城市，住在一座平房内的一间小屋里。这座小平房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僻陋小街尽头的土岗上。平房的山墙临近一片火烧场，火烧场上长起了密密层层野草；在苦艾、牛蒡、马蓼的杂草丛和接骨木的灌木林里，隆起一堆倒塌了的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是个大地窖。无家可归的野狗就住在这里，死在这里。这个大地窖我终生难忘，这是我所上的几所大学中的第一所大学。

叶夫列伊诺夫的家里，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儿子，靠一点可怜的抚恤金维持生活。我到他们家里来的头几天，常看见这个脸色苍白、个子矮小的寡妇从市场回来，把买来的东西放在櫈桌上，怀着何等悲痛的忧伤，思量着怎样解决眼前的难题：即使不把她自个儿算在内，又怎能用这么小小一块瘦肉来给三个健壮的大孩子做出一顿丰盛的美餐呢？

她是一个很沉静的女人，两只灰色眼睛里含着无可奈何的温良的顽强劲头儿，好象是一匹累得筋疲力尽的母马在拉车上

坡，自个儿明知拉不动了，可是依然得拼命地往上拉！

我来到她家的第四天早晨，当她的孩子们还没有睡醒的时候，我就到厨房里帮着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说：

“您上这儿来打算干什么？”

“念书，来上大学。”

她把两道眉毛往上一扬，跟着脑门上的黄肉皮也往上一皱，菜刀切破了她的手指头，她忙用嘴吮着伤口的血，全身跌落到椅子里，马上又跳了起来，叫道：

“噢唷！见鬼……”

她用手绢裹好切伤的手指以后，夸奖我说：

“您倒挺会削土豆的！”

哼！这还能不会！我顺便跟她说了我先前曾经在轮船上做过帮厨的事。她又问：

“您想，您凭这点儿就能上大学了吗？”

当时我还不不懂什么叫作挖苦人。我把她的问话当真了，就一五一十地对她讲出我计划好了的行动步骤，还说，经过这么一努力，科学殿堂的大门就会向我敞开。

她叹息了一声，叫道：

“喂！尼古拉！尼古拉……”

正当这时候，尼古拉走进厨房来洗脸了。他睡眠惺忪，乱发蓬松，照例是高高兴兴的。

“妈妈！包一顿肉馅饺子吃多好啊！”

“嗯，好吧。”妈妈顺从地回答。

为了想趁机会炫耀一下我的烹饪知识，我说，要是包饺子的话，那点儿肉可太瘦，也太少啦。

这下可惹得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生气了。她狠狠地抢白

了我几句，羞得我满脸通红，耳朵发胀。她把手里的几根胡萝卜丢到橱柜上，一扭身就走出去了。尼古拉向我递眼色，解释妈妈的行动说：

“不高兴啦！……”

他在板凳上坐下来，继续对我说：女人都比男人爱生气。这是她们的天性，关于这一点，好象有位瑞士的大学者作出过铁一般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也谈起过这个问题。

尼古拉很喜欢教我，每逢适当机会，他就来给我灌输一些生活必需的知识。我对他的话，总是洗耳恭听。后来，我竟把佛克、拉罗士佛克和拉罗士查克林^②这三位古人混成了一个人。我也弄不清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③砍了杜模力^④的头呢，还是反过来杜模力砍了拉瓦锡的头？这位青年好汉，真诚无私地想“把我教导成人”，他也蛮有把握地答应要这样做。可惜他没有时间，更没有条件来认真地好好教我。他那种青年人的轻佻浮躁和只顾自个儿的作风，也使他看不见可怜的妈妈是怎样终日操劳、煞费苦心地支撑家务。他的弟弟是一个又迟钝又沉闷的中学生，就更觉察不出这一点了。我倒是早已乖觉地看出了这个主妇的那一套复杂的厨房经济和化学戏法。我清楚地看见她的手法多么巧妙：天天总得想法儿喂饱自家的两个孩子，另外还要养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野的流浪儿。自然，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就跟一块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开始想去

①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② 佛克(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拉罗士佛克(1613—1680)，法国作家。拉罗士查克林(1772—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派的首领。

③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法国大革命中被反革命派杀害。

④ 杜模力(1739—182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保皇派。

找点什么工作干。为了免得在她家里吃闲饭，我每天一清早就跑出去，遇上刮风下雨，就暂时躲到那片火烧场的荒芜的大地窖里，闷坐在里面听着大雨滂沱和狂风吼叫，闻饱了死猫死狗的臭味，我这才觉悟到：上大学——不过是一个梦想罢了，要是当初我去波斯，也许比到这儿来还好些吧。于是我就把自己幻想成一个白胡子的老法师，能叫每粒谷子长成苹果那样大，能叫每个土豆长到一普特^①重，总之，我为了这大地，为了这不光我一个人穷苦得走投无路的大地，幻想出了不少为民造福的好事情。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许多奇异的冒险和伟大的英雄事业。在生活困难的日子里，这些幻想对我很有帮助。可是苦难的日子真不少啊！所以我就变得更会幻想了。我并不期待别人的救助和偶然的幸运，我的意志逐渐磨练得顽强起来；生活条件越是困难，我就觉得自己越发坚强，甚至越发聪明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人是在对周围环境的不断反抗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致挨饿，我常跑到伏尔加河的码头上去。在那儿还容易挣得十五到二十戈比的工钱；在那儿，我混入那些装卸工、流浪人和无赖汉们中间，觉得自个儿好象是一块生铁投进了烧红的炉火里一样，每天都给我留下许多又强烈又深刻的印象。我看见那些狂热露骨、生性粗野的人，在我面前旋风般地转来转去。我欢喜他们对现实生活敢于憎恨、对世界的一切敢于敌视嘲笑、对自己又满不在乎的乐观态度。由于我过去的生活经历，使我很容易跟他们接近起来，愿意加入到他们那个厉害泼辣的圈子里去。想到我曾经读过的勃来特·哈特^②的作品和许多“低级趣味的”小说，就更加激起我对这些人的同情。

① 一普特合一六·三八公斤。

② 勃来特·哈特(1839—1902)，美国小说家。

有一个职业小偷巴什金，原先是师范学校的学生，现在是一个受尽折磨并且患了肺病的人，他很乖巧地劝我说：

“你为什么老象个姑娘那样畏畏缩缩的呢？难道是害怕人家骂你不老实吗？对姑娘说来，老实永远是她的美德。然而，对你——不过是一条锁链罢了。公牛倒挺老实，那是因为它吃饱了干草！”

巴什金的头发是棕黄色的，象戏子似的脸刮得光光的，矮小的身体象猫似地轻快机灵。他以教师和保护人的态度对待我，我看出了他确是诚心诚意盼望我将来能够有点成就并且获得幸福。他很聪明，读过不少好书，尤其爱读《基度山伯爵》^①。

“这本书中有目的，有激情。”他这样说。

他很欢喜女人，一谈起女人真是津津有味，兴趣横生，从他那极度衰弱的身体内部发出一种痉挛；这种病态的痉挛使我直感到恶心。不过我仍然聚精会神地听他谈，因为我觉得他的话很优美动听。

“女人，女人！”他声调抑扬地说，黄色面皮上泛起了红晕，两只黑黑的眼睛闪着赞赏的光芒，“为了女人，我什么事都肯去干。女人跟妖魔一样，从来不晓得什么叫罪孽！再没有比跟女人恋爱更甜美的事啦！”

他很会讲故事，毫不费力地就为妓女们编出一些歌唱不幸的爱情的哀婉动人的小调。他所编的小调唱遍了伏尔加河两岸的各个城市。下面这一段极流行的小调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奴家生活寒苦，脸儿不漂亮，

① 《基度山伯爵》是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作品。

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好衣裳。

为了这个呀，姑娘！

谁也不来跟你拜花堂……

有一个行迹诡秘的人，叫特鲁索夫，他待我也很好，这人仪表端庄，穿着阔绰，有音乐演奏家一样纤巧的手指。他在城郊造船厂区开一间小店铺，门面上挂着“钟表匠”的招牌，暗地里却买卖盗窃来的黑货。

“彼什科夫，你可不要学偷东西这玩意儿！”他对我说，一面很庄重地抚摸他那斑白的胡须，眯起那双狡猾的、藐视一切的眼睛，“依我看，你不会走这条路，你是个重精神生活的人。”

“什么叫重精神生活？”

“啊，重精神生活的人没有羡慕心，只有好奇心……”

这样说我是不确切的，因为我对好多人和好多事都羡慕过，象巴什金那种用奇特的诗歌般的声调、出人意外的比喻和表达方法讲话的本领，就使我羡慕。我记得他讲一件恋爱故事的时候是这样开头的：

“漆黑的夜晚，我象缩在树洞里的猫头鹰一样，枯坐在斯维亚日斯克这个僻陋城镇的客店里。正当十月天，细雨绵绵，秋风瑟瑟，就象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拖长着嗓门哼唱哀歌似的，老也没个完：噢—噢—噢—呜—呜—呜……

“……恰在这时候，她来啦，她是那么轻盈，鲜艳，宛如旭日东升时的彩云，而天真纯洁的眼神却是假装的。她用恳切的声调说：‘亲爱的，我没有对不起你吧！’我明知她在说谎，却相信这是真话！我凭理智看得清清楚楚，可是情感上总不相信她是说谎！”

他讲话的时候，全身有节奏地摇摆，眼睛眯缝着，有时候还轻轻地用手摸一摸自己的心坎。

他的声音虽然低哑，但每一句话都很清晰动听，有点象夜莺歌唱。

我也羡慕过特鲁索夫，他有声有色地讲述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尖刻地嘲笑大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悄悄地讲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位沙皇当皇帝真是个能手！”

在小说里常有一种“坏人”，这种“坏人”每到小说末尾，竟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突然变成胸襟宽大的英雄人物了。我觉得特鲁索夫很象这类“坏人”。

一遇到闷热的夜晚，人们就渡过喀山河去，坐在对岸草地上的矮树林里，一面吃着，喝着，一面交谈着各人的心事。多半是讲生活的复杂啦，奇怪的人事纠葛啦，特别爱谈的是女人问题。他们一谈起女人来，就那么怨恨、悲伤，有时又很动人，而且总是带有向黑暗窥视的心情，在那黑暗中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星光惨淡的黑夜，我曾经跟他们一块儿躺在长满河柳树的闷热洼地里度过了两三个夜晚。因为这儿临近伏尔加河，夜气更显得潮湿，船上的桅灯好象一个个金蜘蛛在黑夜里向四方爬动，在那黑魑魑的岩石河岸上闪现着一簇簇火球和火网，这是富庶的乌斯隆村里的酒店和村民住宅的窗户发着光亮。轮船的蹒跚隆隆地击着河水。水手们在一排驳船中间象狼嚎似地拚命喊叫，什么地方有人用锤子敲着铁板，拖长凄凉的音调在唱歌，排遣着不绝如缕的忧思，给人们的心头添上一点淡淡的哀愁。

更令人哀愁的是听着这些人的轻声漫语，他们思考着生活，

谈着各人的心事，可几乎谁也顾不得听谁的。他们在矮树林里或是坐着，或是躺着，吸着卷烟，偶尔喝上一杯伏特加或啤酒，接着就回忆许多往事。

“啊，我遇见过这样一件事，”在黑暗中紧趴在地面上的一个人说。

听完了他的故事，人们都一致表示：

“常见这类的事啊，都是常见的……”

“见过”，“这是常见的”，“见过不少遍啦”，——听着这些话，我觉得今天夜里人们已经活到了生活的尽头，好象一切都已经见过，以后再不会有什么新鲜事了！

这种感觉使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疏远起来，不过，我仍然很喜欢他们。根据我的经历来讲，如果我走上他们的路子，那也是十分自然的。当我想向上爬和进大学念书的幻想碰壁以后，我就更想去跟他们接近了。遇到饿肚子、受气和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本领去侵犯“神圣的私有制”或者去干其他种种罪行；可是青年人的浪漫主义不许我脱离我应走的道路。我在那个时候除了人道主义的勃来特·哈特的书和一些低级趣味的小说以外，还读过不少很正派的好书，这些书鼓励我去追求那种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但却比我已经见过的一切具有更重大意义的事物。

这时期我又认识了几个新朋友，获得了一些新观感。有许多中学生常到叶夫列伊诺夫住宅旁边的空场上来玩击木^①游戏。他们中间的一个名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学生面皮微黑，头发略带蓝色，象个日本人，满脸雀斑，

① 俄罗斯人常玩的一种游戏，画地为城，把几根短木棍竖立方城内，用木棍远远打去，以打出城外的短木棍多少决胜负。

好象皮肤里擦进了火药末似的。他老是那么快快乐乐，玩起来很灵巧，谈起话来很俏皮，他身上真象是包藏着多种天才的幼芽。他跟一般有天才的俄罗斯人一样，光靠这点生来的天才过日子，再不想努力去发展和提高。他有锐敏的听觉，对音乐有极高的鉴赏力，也很爱好音乐，能够象艺人一样很优美地弹古丝理琴，弹三弦琴，拉手风琴，却不想进一步去精通更高级和更困难的乐器。他很穷，穿得很坏，可是他那揉皱了的破汗衫、满是补钉的裤子和磨透了底的皮靴，倒也很适合于他那种豪放的性格、挺拔身材的敏捷动作和大手大脚的粗率作风。

他好象是一个长期卧病刚刚爬起来的人，又象是一个昨天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对他都是新鲜的、舒适的，使他感到极大的欢快，他简直象满地飞窜的花炮似的跳来跳去。

他听说我生活困难，处境险恶，就劝我去跟他住在一起，并且劝我准备去做乡村小学教师。于是，我就到这个有趣的怪地方——“马鲁索夫卡”大杂院里来住了，可能有多少代的喀山大学生全很熟悉这个大杂院。这是雷布诺里亚德街上一所破旧的大房屋，这真好象是那群饿着肚子的大学生、妓女和受尽折磨而失掉人形的穷鬼们，直接从房主手里夺过来的大房屋。古里住在从走廊通到阁楼去的楼梯底下，那儿放着他的一张木板床，走廊尽头的窗子旁边摆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陈设了。走廊通着三个房间，两间住着妓女，第三间里住的是一个患肺病的神学院大学生，数学家，个子又高又瘦，样子怪可怕的，满头满脸生着红色的硬毛，用肮脏的衣片勉强遮着身子。从衣服破绽里裸露出挺可怕的青虚虚的皮肤和瘦棱棱的肋骨。

他好象只是靠着吃自个儿的指甲过日子，把手指头啃得快

要出血了。他黑间白日地画呀，算呀，还不断低声吭吭喀喀地咳嗽。妓女们都怕他，说他是疯子，可是又可怜他，常在他的门口偷偷丢下一些面包、茶叶和砂糖，他就把这一包包的东西从地上捡回去，好象一匹累坏了的马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如果妓女们忘记了或因什么缘故不能给他送礼物来，他就打开房门，沙着嗓子向走廊里喊：

“面包！”

在他那陷进黑眼窝去的眼珠子里，闪耀着一种自命不凡的狂人的高傲神气。偶尔有一个罗锅儿的小怪物来看他，这人拖着一条瘸腿，肥肿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的眼镜，头发斑白，在他那阉割派教徒^①的黄脸上浮着狡猾的微笑。他俩紧紧关起房门，怪安静地一连默坐上几个钟头，只有一次在深夜里，这位数学家沙声的怒吼把我吓醒了：

“依我说——这是监狱！几何学——是鸟笼，哼！是老鼠笼子，哼！监狱！”

瘸腿的罗锅儿尖着声儿吃吃地笑，反复不断地说着一句什么挺难懂的话，可是数学家突然高声叫道：

“王八蛋！滚！”

这位客人被赶到走廊上，气得呼呼的，一面尖声地叫骂，一面用宽大的破斗篷裹起身体。这时候细高个儿的数学家站在门口，样子凶狠，把手指头往乱蓬蓬的头发里一插，沙着嗓子喊叫：

“殴几里得^②是个大傻瓜！大傻一瓜……我敢说，上帝比这个希腊人更聪明！”

① 又译作“修心派”，该派产生于俄国十八世纪末，主张摆脱“世俗生活”，教徒必须实行阉割手术以绝欲。

② 欧几里得（公元前315—前255），古希腊的几何学家。

他猛然把房门一关，震得他屋里的什么东西“咯啦”一声掉了下来。

这以后不久，我听说他原打算从数学上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没等他完成这件事，就先死了。

古里在一个印刷厂里做报纸的夜班校对员，每夜挣十一戈比的工资。如果我来不及出去做工挣钱，我俩一天就只能吃上四俄斤^①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我是没有很多时间去做工的，因为我要学习。我正在硬着头皮钻研各门学科，那些挺拘谨死板的语法格式尤其使我苦恼，我简直不会把生动的、劳动人民俏皮巧妙的现代俄语嵌进僵死的语法格式里去。好在不久我已经明白，学习这些东西对我未免“过早”了。即令我当真取得了当乡村教师的资格，由于我年纪太小，也绝不会得到教师职位的。

古里跟我睡在一张木板床上，我黑夜睡，他白天睡。当他干了一整夜的活儿，清早脸色变得更加乌黑，红着两眼回来的时候，我赶快跑到小饭馆里去买开水（当然，我们自己是没茶炊的）。随后，我俩就靠窗边坐下来啃着面包喝茶。古里讲报纸上的新闻给我听，朗读那位笔名“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的滑稽打油诗。我很惊奇古里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我看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正跟他对待那个倒卖女人旧花衣兼替人拉皮条的胖婆娘加尔金娜的态度完全一样。

他是从胖婆娘那儿租来这个楼梯下的小屋角的，可是由于付不出房租，就给她说笑话，拉手风琴，唱些动听的歌曲；每当他用男高音唱起歌来，两只眼睛就闪出讥笑的光芒。胖婆娘加尔

① 一俄斤合〇·四一公斤。

金娜年轻时做过歌剧班的合唱演员，她很能领会歌词的意义。她常常感动得一串串泪水从那老不害羞的眼睛里直淌到她这个酒鬼和馋鬼的青肿的脸颊上来，她用胖手指头抹掉脸颊上的泪水，然后再拿出一条肮脏的小手绢仔细地擦她的手指头。

“哟！我的好古里呀，”她赞叹地说，“您真是个艺术家哟！要是您的脸子再漂亮点——我会给您找点好福气的！我介绍过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守空房的娘儿们解闷！”

在我们头顶上的阁楼里就住着这样一个“年轻小伙子”，他是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身材，宽胸阔背，胯股奇瘦，全身看来好象一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面的锐角被折断了一点儿。这大学生有一双跟女人一样的小脚，脑袋也显得很小说，快缩进肩膀里面去了。脑袋上盖着一层马鬃般的红头发，苍白贫血的脸上无精打采地瞪着两只凸出的绿眼睛。

这个大学生违抗父亲的意旨，象丧家狗一样忍饥挨饿，好不容易才从中学毕业升入了大学。以后他发觉自己有一副好嗓子，能发深沉、柔和的男低音，又想去学唱歌了。

正为着这一点，加尔金娜才寻到他的头上来，并且把他介绍给一位富商的太太，这位太太四十来岁，她有一个儿子在大学三年级，女儿也快要中学毕业了。商人太太是个干巴女人，瞧她那平板板的胸脯，直挺挺的姿势活象一个兵士，脸儿冷冷的又象一个绝欲的老修女。她那两只灰溜溜的大眼睛陷在白眼窝里。她身穿一件黑色连衫裙，戴着老式丝绸头巾，耳朵下面耷拉着两只镶宝石的耳环，颜色是贼绿贼绿的。

她时常在黑夜或大清早来找她的这位大学生。我有好几次看见商人太太一纵身跳进大门口，就坚定地往院子里走来。她的脸色非常可怕，嘴唇往里抿得几乎看不见了，眼珠子全瞪了出